

唐蕃古道 :从走向路线和巨大影响说起

任玉贵

曲径行回两城间,斜阳卸影鸟飞还。云重峭壁青千丈,风皱奔流绿一湾。踏破丹梯崖似岩,凿开石锁坦为关。往来茶马从此过,地大势高一线川。

这首诗是唐蕃古道气势磅礴的真实写照。

一、古道背景与定位

青藏高原自古就与中原华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历史,而且是古代西域文明、中亚文明、南亚文明与华夏文明沟通的重要通道。尽管青藏高原一直天水一方,被联合国认定全球四大超净地区之一,但就在这天老地荒,雪域绝境,荒漠草原之间,古老的中原民族和高原民族为了生存、迁徙和交流,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探寻着高原与外界的交往通道。这些古道沟通了部落间的联盟,开辟了茶马古道的交通,打通了高原内外交往的途径,也为今天青藏高原的交通网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众所周知,在许多青藏古道中,迈古超今,脉络贯通,著称于世的是“唐蕃古道”。这个因为一场盛大的婚礼而得以发展延续的古道,如今又成为唐代长安通往当时吐蕃王朝首府逻些(今西藏拉萨)的专用名词,成为许多考古工作者和现代旅游者追寻的热点,上溯千古,下踞万年,直耀东西,横炯南北,秀丽飘逸,斯于盛名,可以知矣。唐蕃古

道的形成和演变,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它象一条金色的彩带,飘落在银装素裹的青藏高原,它留下了汉藏人民世代友好往来的足迹。

交通是历史发展脉络之一,《中国交通史》中说“疆域所及即是交通所至”,中原通往西藏的交通,在唐以前就有路可通的,可谓“无形到有形,有限到无疆”。据史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在西北传播的主线就是这条路径,说明它在五六千年以前早已形成。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修驰道,这条古道成为秦国通向古雍州的国道。但它的真正形成而且见于史籍是在唐代。公元七世纪前期,由松赞干布做了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的许多部落,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定都逻些。那时内地正是唐太宗治下的贞观盛世时期。松赞干布爱慕唐朝的文化,于唐贞观八年(634年)派出第一批使臣访问长安,唐朝使臣也很快到吐蕃回访。贞观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命大相(宰相)禄东赞,带着黄金五千两和珍宝数百件又一次向唐朝求婚。唐太宗审时度势,将美丽绝伦的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带领人马迎亲于柏海(今鄂陵湖和札陵湖)。文成公主入蕃和亲不仅揭开了唐蕃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而且为开拓唐蕃古道,发展祖国边陲交通,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这里还需要提出:早在两汉时期,中国内地与南亚诸国已有交往,其通道一是由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出葱岭,经撒马尔罕南行入南亚诸国;二是由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出葱岭而后入印度、泥婆罗(尼泊尔)诸国。后来随着“唐蕃古道”、泥婆罗道的畅通,形成了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泥婆罗道而至印度等南亚诸国的新通道。此后,唐代许多高僧都曾往来于此道求法或求经,他们在遍洒佛教种子的同时,也带动了双方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据《大唐西域高僧求法传》和《法苑珠林》载,贞观年间(627-649年),玄奘等人去天竺求法,路过吐蕃时,得到文成公主资助,文成公主还送他们去北天竺。王玄策出使五天竺(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返唐后,入朝表奏玄奘等人的德行,唐王召玄奘等人入京。他们返抵泥婆罗时,得到泥婆罗王的接见和资助,送他们到吐蕃,他们再次见到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又一次资助他们,于是他们经过苏毗、吐谷浑回到长安。元朝时,应八思巴之邀前来西藏建造佛塑和铸造金佛的阿尼哥还被邀到大都参加了元朝首都的建设。到明清时期及以后,这条通往南亚诸国的通道仍在沿用。

二、古道走向与路线

关于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的

走向和路线,知根知底,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三种提法:第一种认为文成公主由今天的川藏公路入藏,即由西安出发,经过宝鸡、天水、文县、松潘、金川、丹巴、康定,渡长江,经玉树入藏抵拉萨。这条古道,作者于2009年6月在松潘西城亲眼目睹,那里竖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路过此地的塑像及碑文;第二种看法认为文成公主由今天的青藏公路入藏,即从西安出发,经西宁、日月山、倒淌河、都兰、格尔木、逾唐古拉山,过黑河而抵达拉萨,称“青藏西道”;第三种说法认为文成公主是由甘、青、藏一带藏族自治州沿用的入藏大道(亦称入藏朝佛大道),即经天水、临洮、兰州、乐都、西宁、日月山、恰卜恰、温泉、黄河源,越巴颜喀拉山,由清水河镇至玉树,逾唐古拉山经西藏那曲而入藏的。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第三种说法符合文成公主进藏的古道。

文成公主进藏的这条唐蕃古道一般被分为东西两段。东段的道路,约928公里,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走向大体上是一致的。从史料上来看,这条道路在西汉将军赵充国率军平定羌乱,从甘肃天水进入青海,令士兵修筑湟峡(即今乐都大峡)以西道路,途径今湟源到青海湖,称“湟中羌道”。晋代宋云去天竺求经从洛阳出发,到赤岭(今日月山),称“求经孔道”,已成为有史可据的具有“官道”性质的大道。唐代以来,为了保证中原与河湟地区交通的畅通,在由关中通往河湟一带的沿线多置驿馆,维修道旁的州(郡)、县城堡,还新筑或迁筑了一些州(郡)、县于道路沿途,使得道上城寨、驿馆相连,形成唐代长安至鄯城一线的正驿官道。据《新唐书·地理志》、《册府元龟》所载,唐蕃古道的具体走向和路线是:唐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一唐咸阳县驿(咸阳市)一唐兴平县驿(兴平县)一唐马嵬驿(马嵬镇)一唐武功县驿(武功县)一唐扶风县驿(扶风县)一唐岐山

县驿(岐山县)一唐凤翔府治(凤翔县)一唐汧阳县驿(乾县)一唐汧源县,为陇州治,有驿(陇县)一唐上邽县,为秦州治,有驿(甘肃省天水市)一唐伏羌县城(甘谷县)一唐陇西县城(武山县)一唐襄武县城,为渭州治(陇西县)一唐渭源县城,西有武阶驿(渭源县)一唐狄道县城,为临州治(临洮县)一唐大夏县城,西有大夏川驿(广河县)一唐枹罕县城,为河州治,有驿(临夏市)一唐凤林县城(莲花镇)一唐凤林戍地(炳灵寺)一唐龙支县城附近(青海民和县古鄯镇)一唐湟水县城,为鄯州治,陇右节度使衙在城内,有驿(乐都县)一唐鄯城县城,有河源军城及驿站(西宁市)。

唐蕃古道西段,约2125公里,据《西宁府新志·武备》《海藏纪行》西藏目中记载的西宁到拉萨的走向和路线,据考察就是根据唐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入蕃的路程报告记录下来的。鄯城(西宁)起西行六十里临蕃城(镇海堡),又六十里白水军绥戎城(湟源),西南六十里定戎城,南隔河七里天威军(石堡城),西二十里赤岭(日月山)。入吐蕃界,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海南州曲沟附近)。经公主佛堂(大河坝)和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谷浑界)。经暖泉、烈谟海(今喀喇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札布隆山口)。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西界(石渠县境)。经牦牛河(金沙江上游),渡藤桥(玉树结石河下游)一百里至列驿。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渡大月河(杂曲河)、罗桥、潭池、鱼池五百五十里至悉诺罗驿(金沙江上游)。经乞量宁水桥、大速水桥(怒江上游)三百二十里至鹤莽驿(即当拉岭口)。又经鹤莽峡十余里,有瀑布三条,再百里至野马驿。经吐蕃垦田(阿克河谷内)、乐场桥,四百里至合川驿(那曲)。经怒谟海一百三十里至哈不烂驿,又六十里至突

录济驿。又经柳谷、莽布支庄、汤罗叶遗山和赞普祭神所,共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羊八井)到逻些(拉萨)。

唐蕃古道的走向和路线素有盛名,震古烁今,贯如一终。从总体走向方面说,从长安—日月山—拉萨。从粗略路线方面说,从长安—天水—风林关—西宁—日月山—玉树—那曲—拉萨。从具体道路来说,从长安出发,经今天水、风林关转入青海,经民和、乐都(鄯州)、西平、临蕃城(镇海堡)至湟源,顺羌河(药水)至库山(哈城)、赤岭(日月山),经尉迟川(倒淌河),苦拔海、王孝杰米栅、公主佛堂、大非川、那录驿(鄂拉山)、暖泉、烈谟海(喀喇海),然后渡黄河,经玉树地区,再往西南行,经今藏北黑河,迳赴拉萨。令人羡慕的是唐蕃古道上述走向和路线中,长安、风林关、西宁、日月山、玉树五大关隘和要津,无比灿烂辉煌。古道起点长安,今称西安,自史前11世纪起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与雅典、罗马、开罗美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风林关是入青重要渡口,那里壁画已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宁是青海省省会,是中原赴西藏的门户,也是历史上丝绸南路和唐蕃古道上的重镇。日月山是历史上曾是中原和青藏边远地区进引商贸、文化交流的集散地和军事要冲,青藏高原最早“茶马互市”之称。玉树很早就是西宁丹噶尔(湟源)、四川康定、西藏拉萨之间的唐蕃古道上的明珠,素有“高原商埠”、“江源雄镇”之称。

由于一千三百多年来的政治沿革、军事冲突、民族迁徙、宗教传播、自然等众多因素,造成唐蕃古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复杂多变的走向和路线,无疑也彰显了唐蕃古道的神秘与魅力。诸如古道东段至临洮以后,又有两条道路可通达鄯州,一条是由河州(今甘肃临夏)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另一条是经兰州至鄯州。这两条道中,河州至鄯州一道为正道,经兰州之道为辅道。至今炳灵寺石窟内发现的《炳灵寺记》

题记中,便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年)朝内御使大夫崔琳率71人使团入蕃,道经河州炳灵寺时所留下的题名。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亦载唐文成公主入蕃时,曾在炳灵寺作短期停留,并雕刻有八丈佛像一尊等,这些遗迹都反映出唐代入蕃驿道河州道所居的重要地位。

唐蕃古道进入鄯城(西宁)据传到日月山有两条古道:一是从西宁起经多巴过拦隆、拉沙、入拉尔贯、北山、从前沟出,到扎藏寺,过长沟、小寺尔,到草原,直至日月山口;二是从西宁起向南过上新庄、翻拉脊山、过分水岭、直指哈拉库图,到日月山口。

唐蕃古道沿湟水谷地西行至今湟源县,有两条近便之道,一条向西北仍沿湟水谷地行,经今海晏县,穿日月山北段山口,至青海湖北岸西行,这一路依山傍水,地势平坦,主要为河谷、湖滨平原区、日月山为谷口地亦不险,基本和缓而上,水草丰美(尤以青海湖滨为最)。文成公主信仰佛教,曾在古刹扎藏寺诵经拜佛,并给寺院留下戒指、念珠、手镯,稍上柏令嘴石崖上有“公主佛堂”,上世纪七十年代作者还亲眼看见过,石板上刻有文成公主像一尊。另一条,由湟源县向西南,进入拉拉河,经拉卓奈、石崖庄、三条沟,过巴汉村,进入此处,虽有40公里的越山路,平坦如砥,古道热肠,到达日月山下山口仍不失为一优良古道。原来这里也有一块“字儿石”,上面刻有吐蕃文、汉文,模糊不清,唯“开元十九年”数字清晰可认,与《炳灵寺记》题记同出一辙。据《西宁府续志》中有“开元十九年春正月遣鸿胪卿崔琳使吐蕃,是年九月吐蕃派其相入见,请于赤岭(日月山)为互市,许之”。至今日月亭中存放着(开元二十一年(732年)唐蕃“两国和好,无相侵暴”的“赤岭分界碑”仍历历在目。

文成公主进藏到今玉树地区,虽然起点(称多县清水河镇)和落点(西藏

的那曲)是一致的,但具体走法却有较大区别,据《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记载,大致有西线、西南线、南线三种不同说法:西线是说从清水河经今曲麻莱县,大体溯通天河西南行,过西藏的那曲至拉萨;西南线是说从清水河经今玉树县、杂多县,出查午拉山口,过那曲至拉萨;南线是说经今玉树县、囊谦县及西藏的丁青县、巴青县,过那曲至拉萨。据传文成公主在玉树贝纳沟,亲自制定尺寸、格局和图案,率领工匠在沟内悬崖峭壁上雕凿了佛像。唐景龙四年(710年)唐蕃交好,再次联姻,金城公主沿文成公主走过的入藏古道,发现了文成公主遗留下来的雕像,令人修建庙宇,并命名为“文成公主庙”。藏文史料《西藏王统志》、《安多政教史》等记载也似乎证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上述的文化遗址是唐蕃古道最具诠释的历史见证。

三、古道价值与影响

(一)政治往来频繁。伴随着唐蕃古道的形成,唐蕃之间的政治联系不断加强,尤其是唐蕃使臣的相互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0多年间唐蕃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其中唐使入蕃66次,吐蕃使臣入唐125次,这中间有朝贡、议盟、盟会、修好、和亲、告丧、吊祭、封赠、求请、报聘、慰问、约和等诸多表现汉藏团结友好的活动,其中对汉藏关系影响最大、历史意义最深的来往就是汉藏间的和亲活动。

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和吐蕃松赞干布的联姻,标志着唐蕃政治关系迈出了亲善友好的历史性一步。而70年后金城公主的再次入蕃,使唐蕃之间的政治和好关系得到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双方频繁的往来在增进汉藏民族间了解的同时,也增进了两个民族间的友善和融合,二者曾一度达到了一种唇齿相

依、休戚与共的境界。而以“偃兵息人”和“团结邻好,安危同体”为目标的军事交往也使唐蕃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以和平友好为主,作为解决矛盾的使者,也总是身衔和平使命奔走于唐蕃两地,为双方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安居乐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据史记载: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到十九年,蕃使名悉腊和唐使皇甫惟明、崔琳等在长安和逻些的出使活动,就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赤岭(今日月山)划界树碑和设市贸易铺平了道路。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蕃使讷罗和唐使刘元鼎,分别在长安同宰相崔植以及在逻些和赞普赤热巴巾的会盟,对于重申“甥舅之好”和巩固、发展唐蕃“同为一体”的亲密友好关系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时,作为河湟吐蕃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角厮罗政权在青唐(今西宁)的崛起和与宋朝君臣关系有确立,使藏汉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得到延续和加强。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至哲宗元符元年(1078年)的70年间,角厮罗向宋朝贡达80次之多。到了元代,包括今西藏在内的藏族聚居区全部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体系中,藏汉人民的交往和团结有了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两大系统的转世制度得以确立,新达赖和班禅的确立都必须得到清朝皇帝的批准。达赖喇嘛和班禅每两年须各遣使朝贡一次。乾隆末年,清兵开进西藏,击败了廓尔喀部的侵略,保全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灾难。民国八年(1919年)湟源籍朱绣受南京政府派遣,以甘肃政务代表团特使身份,沿唐蕃古道到达拉萨,与达赖达成“倾心向内,五族共和”的协议,彻底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可见,唐蕃和亲开创的藏汉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如今还完整屹立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追求和平的汉藏

人民从历史走来,延续历史的最好见证。

(二)经贸交往广泛。唐蕃之间频繁的使臣往返活动,不仅促成了唐蕃之间政治、军事间的交往,更促进了相互间极为广泛的经济贸易交往,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茶马互市”的兴起,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据记载,吐蕃王朝于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731年(唐玄宗开元十九年)以及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曾三次遣使唐朝,分别请许在松州(今松潘)、赤岭(今日月山)设立茶马互市。这些唐蕃共同市场的建立和以缣茶马牛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物资交流活动,对于唐蕃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初唐通过日月山茶马互市共取得马49万匹、牛30万头。唐朝所需的战马与农业生产中的耕牛,通过互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吐蕃通过互市,得到了他们所需的茶叶近4千万斤,布彩十几万匹等物品。双方广泛的贸易交往,大大加快了唐蕃两地经济的发展。

到了宋代,茶马互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设立了掌管茶叶专卖与买马事宜的专门机构——茶马司。由于宋朝设买马厂,并对市易所加强了管理,因而汉藏之间的互市量大增,茶马交易异常活跃。当时的角厮罗政权所在地青唐城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地,藏族部落之间除了时常进行交易外,还帮助宋朝边官买马。元朝幅员广大,马匹充足,没有必要用实物交换去收揽马匹,至于茶叶营销,仍实行国家专卖制度。明代,出于边防需求,每年必须得到大批马匹来武装军队。由于“蕃人食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于是明朝承袭唐宋的做法,继续与蒙藏少数民族实行茶马市易。明代与茶马贸易配套的管理机构更为庞大,管理制度更加严密,茶马交易更为活跃,而且逐步趋于制度化。到了清朝,在

沿袭明朝做法的同时,对明朝中期以来的茶马互市制度做了一些调整,使制度更加规范划一。到雍正末年,兴起于唐宋,对汉藏两地经济发生过重要推动作用的传统茶马互市宣告结束。但蒙藏地区以马牛羊为主的畜产品、矿产品、水产品、珍贵药材和中原地区以茶粮布为主的食品、手工业品等产品互通有无的商贸流通并未停止,而且越到后来发展规模越大。其中民国十年(1921年)西藏政府噶厦在湟源设立“噶尔俸”商务机构,每年从藏地区进入中原地区的牛羊上万头,羊毛达500万斤,大黄10万斤,鹿茸2千余架,从中原地区进入藏区的茶1万封约10万斤,粮2万石约2000万斤,布匹1万匹,民族贸易额白银达500万两。国内30多家商号开铺,国外十大洋行在此设庄,形成了西北乃至中国最大的茶马大都。

(三)文化交流深入。伴随着唐蕃古道上经济贸易的繁荣,汉藏两族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从松赞干布开始,吐蕃便“遣酋豪子弟,请入(唐朝)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书疏”,有许多吐蕃人对汉族诗文十分精通。

吐蕃原先“以毡帐而居”,文成公主入藏后,有不少人“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唐诗中有“自从公主入蕃后,一代胡风似汉家”的诗句,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8世纪以后,两地间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那时候,汉族在吐蕃地方机构中担任官职已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在藏汉文化的交融发展中,汉族吸收吐蕃的东西也不少。如白居易《时世妆》里所写道:“元和宫妆君记起,髻堆面赭非华风”。赭面本来是吐蕃人以赭色防晒物质涂面,防风沙护皮肤的一种习俗,但因文成公主不太喜欢而被松赞干布在国中禁止,不曾想这种风俗却传到了长安,并在长安流行一时。

吐蕃的佛教和汉族地区的佛教关系也十分密切。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以

车载运释迦牟尼佛像至吐蕃。赤德松赞时佛教在蕃区进一步得到发展,并逐渐本土化,成为吐蕃人民的共同信仰。另外在历法方面,吐蕃也基本上采用了汉族地区天干和地支配合的纪年方法。

吐蕃王朝崩溃后,历经了约400年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到13世纪中期,元朝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大批藏传佛教僧人往来于中原王朝与藏区之间,丹噶尔(湟源)成为佛教传播的桥头堡,将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族文化传播到元朝皇室,并进而流传到民间。同时,这一时期音乐、历史学、天文历算、医学上都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明清时期,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从西藏迁来东科寺、修建塔尔寺、扎藏寺等成为安多十三大寺之一,这条因唐蕃和亲而开辟的通道依然发挥着它无可替代的作用。

汉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汉藏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互通有无,改善了各族人民生活,同时也使两个民族共同融入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文成公主出嫁的历史文化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统治者所期望的政治作用。藏族人民视文成公主为“绿度母”,歌颂文成公主的藏戏《文成公主》长演不衰,历史弥新。

参考文献:

- [1]张永溪.唐蕃古道志.黄山书社,1996.
- [2]朱绣.海藏纪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 [3]青海省博物馆.唐蕃古道史料辑,1987.
- [4]崔永红等.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 [5]任玉贵,李国权.丹噶尔历史渊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